

仁井田陞遭遇的学科鄙视链

吴真

1928年，一个东京大学本科沿着一条文科的学科鄙视链溯流而上，才过了5年就交出了大部头著作《唐令拾遗》，震惊学界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这一鄙视链却是在以“文求堂”书店为中心的舆论场产生的。

日本著名汉学家仁井田陞（1904—1966），原名“菅野陞”，是大法官菅野善三郎的三儿子。1928年他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毕业，同年过继到也是大法官的仁井田家做养子（田仲一成《我心目中的先师——仁井田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活动》，《古今论衡》第19期）。此前中国学界流传“仁井田陞，原姓菅野，后入赘改姓”的说法，不知从何而来。

菅野陞还是法学部二年级学生的时候，一手创办了学生同人刊物《求母》。这么高深的刊名，来自《道德经》第二十章：“众人皆有以，而我独顽且鄙。我独异于人，而贵求食于母。”当时日本《道德经》通行版本与中国的通行本一样，末句作“而贵食母”。王弼注曰：“食母，生之本也。”河上公则注为：“食，用也。母，道也。我独贵用道也。”此处的“食母”是坚守道之本体的一种表达。各种古代版本之中，只有唐代开元年间的唐玄宗御注一家作“而贵求食于母”，玄宗自注云“先无‘求’‘于’两字，今所加也”。不过这个御注本流传并不广泛，是以中国古籍向无“求母”之用典。一个异国的法律系本科生，从那么偏僻的道经版本之中独拈出“求母”一词，却也应了《道德经》第二十章的真意——独异于人，绝学无忧。

菅野陞初中就读于东京的名门中学——京华中学。1919年入校的春学期，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和田清（1890—1963）恰好入职，在该校教历史。一般来说，东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回到东大执教之前，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“外放”考察期。和田清是白鸟库吉、市村瓚次郎二位东洋史泰斗的得意门生，取得大学院院的硕士学位之后，经历了中学老师、东洋文库的图书管理员等职位上的八年历练，至1927年才被召回东大担任助理教授。日后成为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领袖的和田清，中学老师生涯只有短短三年，却深刻影响了菅野陞的人生道路。“对中国的古典应该抱着文献批判的态度，早在中学时代，和田老师就教会我这一点。”（仁井田陞《中



1930年，时任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助手的仁井田陞（后排左二）与院长服部宇之吉（前排右一）等同事



1934年1月13日，《读卖新闻》关于仁井田陞获奖的报道

仁井田陞肖像，1963年9月

国の法と社会と歴史——研究生活三十五年の回顧》，收入《東洋とは何か》，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版）

菅野陞虽在初中阶段已有史学研究兴趣，但因背负“子承父业”的家族期望，还是入读东京大学文科之中最高分的法学部。本科临毕业之际，菅野陞产生了研究生转到文学部的东洋史学专业的念头。他到东洋文库去找和田清——

“他一边抄写着《大明实录》，一边对我说：‘历史不过是常识一般的学问，没有再进文学部去学的必要。’”

这么一句冷酷的话语，从自己敬佩的东洋史老师口中说出，菅野陞自然还是相信的，遂打消了转专业的念头。过了不久，他又到东大附近经营中国书籍的文求堂书店去，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素来对于东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没有好感，他曾评论说，“尤其是那些汉文先生，简直是玩物丧志”。这次他

又指点菅野陞——

“如果进了文学部，特别像‘中国哲学科’那样的地方去学习的话，什么也学不到。”（仁井田陞《文求堂和我》，田中壮吉编：《日中友好的先驱者——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》，极东物产株式会社，1987年版）

既然历史学是常识，中国文学又是玩物丧志，中国哲学更是学不到东西，那么什么专业最好呢？“经田中先生指示，我去了赤城神社由川合氏主办的星期天开讲的‘说文会’去学习。”1928年开始，改了姓的仁井田陞，一边在东京大学跟随法律史名家中田薰，学习东洋法律史，一边在川合孝太郎主讲的《说文解字》训读会，学习文献训诂学。

文献学>历史学>文学>哲学。这是1928年，一个东京大学本科遭遇的学科鄙视链。沿着这一鄙视链溯流而上的仁井田陞，才过了5年就交出了大部头著作《唐令拾遗》，震惊

学界。已经散佚的唐代律令是古代东亚社会影响最深的律法系统，多年以来，唐律的复原作为日本学界的一大难关，已有仁井田的太老师、日本法制史研究开山宗师——宫崎道三郎，以及仁井田的导师中田薰，二人联手在1901年发表长篇文章。但是从那以后，复原的工作又被当作“多年悬案”而搁置起来，因为难度太大。

攻克这一难关的仁井田，在法制史的本色当行之外，身负历史学、文献学的绝技，他从一百多种中日罕见典籍之中搜罗复元了近60%的唐律，而且大量利用了新发现的西域文献。仁井田之前所有的知识储备，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唐律复原的研究之中。此书一出即好评如潮，东京大学法学部长穗积重远撰写书评，推崇这一在文献辑佚与史料考证方面将师门传统发扬光大之“大事业”（1933年9月15日《东京朝日新闻》）。1934年1月，颁发给

文理科各一个成果的日本学术最高奖励——学士院恩赐赏，颁给众望所归的《唐令拾遗》，当时仁井田陞刚刚过完他30岁的生日。无论理科还是文科，学者荣获恩赐赏的最小年龄纪录，至今仍为仁井田所保持。

可以说，《唐令拾遗》见证了日本昭和初期的学科鄙视链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这一鄙视链却是在以“文求堂”书店为中心的舆论场产生的。

文求堂主人——田中庆太郎（1880—1951），出身京都，他在东京外语学校进修中文之后，决定将祖上传做“和本”生意的文求堂，搬到东京大学附近的本乡，转而专营汉籍。在1920—1950的30年之间，由于田中庆太郎卓越的版本鉴识与社会交往能力，文求堂书店成了研究者聚集的沙龙。德富苏峰、内藤湖南、古城贞吉、石田幹之助、郭沫若、高罗佩、神田喜一郎等著名学者频繁出入文求堂。当时关西的学者都说，“如到东京，就算不去东京大学，也得到文求大学走一走”。

“文求堂主人臧否人物和批评社会现象时相当严厉，但是对于有前途的少壮学者、年轻学子却经常照顾。”（石田幹之助《回忆田中氏的一些往事》，收入《日中友好的先驱者——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》）后来成为日本书志学一代宗师的长泽规矩也，在东大本科时期就受到田中氏在文献鉴赏方面的熏陶，而遵循田中氏“学科鄙视链”成长的仁井田陞，得到的照顾更是不得了。他写作《唐令拾遗》的那一年，文求堂刚从中国藏书家傅增湘的手中购入一批宋明珍本，田中氏把这些被列入“国宝”的珍籍免费开放给仁井田任意查阅，还允许他把宋本《白氏六帖事类集》的一页书影登在《唐令拾遗》书中。日后此书获奖，其中也有田中氏在稀见版本上的助力之功。

田中庆太郎绰号“本乡的鬼谷子先生”，鬼谷子既意味着“料事如神”，又有点江湖霸气。东京大学在本乡三丁目，文求